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 发生与演进

ZHONGGUO YUYANXUE PIPING DE
FASHENG YU YANJIN

肖翠云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 发生与演进



ZHONGGUO YUYANXUE PIPING DE
FASHENG YU YANJIN

肖翠云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姚 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发生与演进/肖翠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7175-3

I. ①中… II. ①肖… III. ①语言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4357 号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发生与演进

ZHONGGUO YUYANXUE PIPING DE FASHENG YU YANJIN

肖翠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17175-3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谭学纯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事件,包括诸如“重写文学史”和“重绘文学地图”的价值重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学批评多元格局的形成、更迭和发展,先于“重写文学史”启动的语言学批评,是动态多元格局中的学术看点之一。因为不管是历时坐标上文学史叙述的重新洗牌,还是共时坐标上文学地图的重新标注,最终必然落实为文本语言的生动在场。

然而这一点被中国学术界深度认知,却是一种迟到的自我修正。在这之前的认知屏障,涉及错综复杂的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和语言观。

从文学的载道功能到政治标准,决定了文学生产和学术生产的共同倾向:对“写什么”的关注,远高于“怎样写”,而在“怎样写”的问题上,“语言工具论”似乎天然地支持“得意忘言”的理论偏误。

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是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可能导向“语言工具论”,其实,用不着深邃的思辨,就可以发现:工具与工具生产的产品是分离的;而语言消融在语言产品中。被切割的语言产品和生产语言产品的语言,没有各自存活的基因,以“语言的艺术”注册的文学生产,不可能剥离语言编码的思想现实。即使最科学的实证研究也无法量化:哪一区块是博大的思想,哪一区块是负载思想在阳光下运行的语言。这意味着“语言工具论”经不起常识的追问,遗憾的是,经不起常识追问的命题

却在我们的认知惯性中迷乱了很多智慧的头脑,而且迷乱了相当长的时间。

文学的语言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它一开始就在双重意义上调整了文学批评的理论站位:一方面,从“写什么”>“怎样写”的认知倾斜中努力找回“怎样写”的修辞策略和规则;另一方面,回到语言本体意义上的“得意莫忘言”,^①返回“得意在言”。仅此而言,语言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中,就是不应该缺席也很难被替代的阵型。

文学批评的自我调整与“语言转向”的他性冲击相遇,合力驱动了一波较具规模效应的学术行情。理论能量的早期开发和其后的辐射波,关涉一份厚重的学术刊物,我曾借《光明日报》的版面讲述过这段学术记忆——

1986年初,《文艺研究》编辑部有过一次产生了话语集散效应的策划:邀集在北京的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围绕小说创作中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表达方式举行座谈——这是一种高起点的召唤。

作为对这种召唤的回应,从1986年第3期到1987年第6期,一批集中讨论小说话语方式的研究文章在《文艺研究》汇聚。开场锣鼓是作家们敲起来的:林斤澜、李陀、何立伟、汪曾祺,纷纷出场;随后是理论话语和评论话语加盟:张志忠、程德培、夏中义、罗强烈、宋耀良、夏刚、盛子潮、朱水涌、谭学纯、唐跃、孟悦、南帆、陈平原、杨义、赵毅衡、李国涛,众语喧哗。他们的文章在《文艺研究》陆续发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言转向”大背景下一个相对集中的早期记录。虽然在这之前,《上海文学》《文艺报》《文论报》等刊物也发表过类似文章,但是就学术话语的集散功能而言,当年《文艺研究》的策划最为成功。

^① 参见黄子平:《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

1988年以后,话语研究文章在《文艺研究》的汇集量有所减少,但仍屡屡见到高水平的出手,除了前面提到的作者有的再次亮相以外,汪晖、葛兆光、张首映、鲁枢元、杨匡汉、乐黛云、刘梦溪、傅修延、王一川、张卫中、朱晓进、周宪、罗钢、曹顺庆、刘纳、周裕锴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曾就话语问题,在《文艺研究》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文艺研究》1986年的那项策划,显现出扩散效应:《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文艺探索》《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艺术广角》《文艺争鸣》《文艺评论》《文学评论家》《上海文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理论与创作》《文学自由谈》《批评家》《学术界》《江淮论坛》《百家》《文艺报》《文论报》,以及《上海文学》《作家》《钟山》等文学刊物的理论栏目,先后介入同类研究。研究对象从小说话语,扩大到文学话语,进而扩大到包括影视作品和音乐、美术作品在内的艺术符号。关键词也趋于丰富:从作家话语方式、话语策略,到叙事策略、修辞策略、书写策略、文本策略、文体策略、解构策略;从话语的权力,到语言霸权、语言乌托邦;从叙事语境,到文化语境;从汉语经验,到母语写作,似乎都可以从《文艺研究》最初的召唤中读出预后影响。可以这样认为,《文艺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热点的语言学批评/修辞学批评,有过前沿引导之功,并且具有话语集散意义:它以话语汇集的方式产生了规模效应,又以话语扩散的方式产生了辐射效应。这种辐射效应还从理论界扩散到创作界,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创作界渐成气象的“语言实验”,与上述刊物在理论上的推动是有关的,而《文艺研究》功不可没。

作为不曾褪色的历史风景,语言学批评没有伴随“语言热”的降温而退场,相反,倒是在部分地走出浮躁之后,延续着较为平稳的运行格局。由此带来学术文献的堆积,呼唤“研究的研究”跟进。但是学术事实显

示:相对于语言学批评本身的丰富成果来说,“研究的研究”明显匮乏。后种意义上的第一部系统专著,是肖翠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发生与演进》,作者此前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批评:行走在文本与文化之间》,可以视为本书的理论热身。

学术叙述在很多情况下是作者恰到好处地把握转述、评述、自述的角色分化和转换:转述、评述、自述,分别显示研究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本书在“转述—评述—自述”的合理分配中呈现经过作者再叙述的语言学批评,也即循着“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的研究思路,对中国语言学批评进行二度阐释。

“转述”是中国语言学批评“发生与演进”的文献学基础。如何忠于源文献,如何按一定的逻辑线索将文献资源纳入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叙述链,对研究主体有专业化的要求,肖翠云以清晰的理路体现了驾驭复杂资料的能力,包括挖掘散落历史尘埃的零珠碎玉,保持数据和样本动态更新。书稿写作期间,作者每每挣脱温馨家居的引力和外部世界的喧哗,几乎回到了读研时代的生活,她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沉于文献阅读的安静与坚定,博赅裁断的细察与审慎,融进了学术“转述”的忠实度。

在我受聘参与评审的各类学术论著或评奖成果中,被“转述”淹没的学术文本为数不少,转述者本人的观点、阐释路径,转述者的话语权,处于隐匿状态。区别于此类“述而不作”的文本,本书将“转述”的文献集合,转化为“评述”的价值重估。书中“评述”语言学批评的价值与缺失,客观公允。文学的语言学批评是文学界和语言学界共同介入的学术生产,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要求语言学批评主体具有跨学科视野和相应的学术训练。理想的状况是既在文艺学和语言学的学科经验之内、又在各自的期待视野之外,整合文艺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滋养、技术路线、研究方法,探寻 $1+1>2$ 的价值提升的可能性。共享学术空间的学科踩线或越位,不是犯规,而是常态。这对语言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来说同样重要。肖翠云跟我攻读语言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后师从我的朋友刘锋杰教授攻

读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又跟我进行文学语言学领域的博士后合作研究。她的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都是围绕语言学批评问题的专论,她近几年结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都围绕语言学批评展开。不同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实践,细化了她对基于不同学科经验的语言学批评模式的敏感,并在本书对语言学批评不同模式的评述中,注入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自述”是更能体现作者创新性的难度区间。从时间观察,语言学批评的启动有漫长的蓄势;从空间观察,理论松绑情境中的思想震荡,重建了语言学批评的场域。综合时间与空间的因素,需要了解学术生产的主体如何把握时机进入话语场?如果早于给定时间节点启动,学术市场有无能力超前消费?如果慢三拍启动,学术市场会不会为反应的滞后消耗更多的文化成本?中国学术界接受语言学批评,本质上是文化资本博弈的结果,折射的是文化资本调整过程中学术生产的个体敏感与群体关注的共振。这里既有历史选择,也有现实参照和借鉴。厘清这些头绪,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学批评在国内外文学批评合流的这一种而非另一种学术走向中预热、兴起与转轨?但仅此不够,“研究的研究”可以提炼更多的话题:语言学批评不仅是学术生产方式,更是批评主体品评对象、展示自我的方式。语言学批评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传统学脉?清末民初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是否可以解读出语言学批评的某些隔代遗传密码?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是否隐藏了语言学批评某些容易被触发的情结?西方的语言学批评在中国登陆如何引爆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转型冲动和实践热情?中国语言学批评是否只能证明西方语言学批评的解释力?如何避免完全依托西方语言学批评解释框架的他者化?中国语言学批评是否尝试过本土化努力?本土化努力之于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如何?语言学批评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解释力、可推导但又很难被完全复制,在于建设性批判和批判性建设推动的良性循环,就此而言,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演进轨迹离上述标准渐行渐远?还是渐行渐近?这一切,是语言学批评

主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学术记录。这类学术记录给中国语言学批评积累了什么样经验？留下了什么样的缺憾？给语言学和文学的跨界研究注入了什么样的能量？同时又夹带着什么样的问题？对此，本书叙述框架精练，重点难点突出，时有新见，持之有故。虽也有点到即止的驻足，但看出破绽，说破还是不说破，确实不好把握。

中国语言学批评从理论到操作，在文学“生产—消费”流程中解释话语世界、文本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追踪文学大势，分析言语细节，以及大气象中的微表情。其中有些研究个案，也许超越单纯的个体存在，敏锐的专业读者，或许可以从中读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断代信息或思想史碎片。本书在“转述”中呈现“史”的面貌；在“评述/自述”中彰显“论”的视野和学理，“转述”体现作者掌控文献的程度，“评述/自述”从“他性”的证明，转向“我性”的在场。如果说“转述”是此类研究的规定动作，那么“评述/自述”则是作者的自选动作，二者相得益彰，凸显本书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并在某些方面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再生产拓展了语言学—文艺学综合观察与阐释的维度。

研究空间的开发与待开发互为镜像，是学术推进的双引擎。展开认知扇面的同时，遥望待认知的新大陆，是学术研究开放性建构的宿命。开放性建构一旦终止，认知便趋于封闭。从皖南乡村田头地边走出来的本书作者，保持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闻一多诗语）的本色。一本书写作完成，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在路上带着敬畏行走。敬畏学术，才不敢轻慢，才会认认真真写出掂量清楚的每一个字，才不会因为“眼低”而下调学术门槛——汉语“眼高手低”倾向负性表达，其实，“眼低”对学术的伤害，远远大于“眼高”或“手低”。“手低”不一定入得了“眼高”的视线；“眼低”却分不清食补和泻药。至于“手低”遇见“眼低”，多半会碰撞出学术被掏空的黑色幽默。

本书所论语言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有我和我的早期学术搭档唐跃先生的参与；所论中国语言学批评从“语言转向”到“修辞转向”的学术背景

与表现形式,^①有我亲历的感触及自我调整。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为本书写序的角色纠缠——

作为“风景中人”,近距离接触 30 多年的中国语言学批评,置身其间的影像记忆重现了某种现场感,它也许可以减少一些隔空喊话的嫌疑,但摄入“我”的视域的风景,不可避免地存在风景遮蔽的背面。“风景中人”努力站在风景之外,尽可能淡化“我”的介入,是正视自我局限的学术理性。天平的一端是带着体温的学术经历,另一端是平复激情的回眸、反思与前瞻,在天平两端平衡叙述很不容易。

30 多年前的语言学批评,如果读者能够从泛黄的纸页品出余味,那是对精神付出的一种回馈;而新鲜出炉的语言学批评,如果已经速冻,那是学术无底线必须承受之重。学术生产建构了中国语言学批评,语言学批评也建构着学术生产的主体,这与我其他场合强调修辞活动的主体创造修辞、也被修辞所模塑的广义修辞观同出一理。这是学术研究与研究主体的互动,我在这种互动中参与中国语言学批评。草拟序文,也许可以看作语言学批评的参与者与研究者的一种对话。

① “修辞转向”之“修辞”,容易被误读为巴赫金批评的“修辞技巧(书房技巧)”,不排除语言学批评有这种可能的倾向,但这绝不是语言学批评的完整面貌。事实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文艺美学的“修辞论转向”,到其后延续的“修辞学转向”,核心概念“修辞”的实际所指,并不是狭义的修辞技巧,而是涵盖“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广义修辞。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谭学纯:《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文艺研究》2009 年第 12 期;《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 年第 5 期。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篇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孕育与萌芽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语言学批评	19
一、理论层面:言意关系探讨与语言学批评	20
二、实践层面:语言形式分析与语言学批评	36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与语言学批评	68
一、文学工具论层面:文学形式变革与语言学批评	69
二、文学本体论层面:文学审美批评与语言学批评	105

中篇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形成与确立

第三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形成与确立(一):20 世纪 70 年代 末至 80 年代初(1977—1984 年)	131
一、文艺学界:为文艺正名	131
二、语言学界:为语言正名	145
第四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形成与确立(二):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1985—1989 年)	149
一、文艺学界:外在引进与内在反思	149
二、语言学界:探索语言的文化性	167

下篇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发展与深化

第五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深化(一):文学语言研究的深化	177
一、文学语言性质和功能的重新审视	178
二、文学语言研究视域的拓展	200
三、文学语言研究视角的更新	214
四、文学语言研究和语言学批评的双向建构	232
第六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深化(二):文学文体研究的深化	236
一、文体内涵的重新界定	237
二、文学文体研究范围的拓展	243
三、文学文体研究方法的更新	255
四、文学文体研究与语言学批评的双向建构	272
第七章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深化(三):发生“修辞转向”及构建 研究范式	276
一、中国语言学批评:从“语言转向”到“修辞转向”	277
二、中国语言学批评两种研究范式的构建	290
结 语	315
参考文献	320
后 记	332

绪 论

—

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①是“文学的语言学批评”或“语言学的文学批评”的简称,指的是“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文学中,用于分析和解释文学语言”。^②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语言学批评具有以下特点:

1. 以本体论语言观为理论基础

语言学批评以西方语言哲学的本体论语言观^③为理论基础,将语言

① 语言学界也有“语言学批评”或“语言批评”的概念,指的是对语言运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或不规范之处进行批评更正,属于语言学范畴。如施春宏在《语言批评的嬗变及存在的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狭义语言批评主要是指出语言运用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意见加以改正,这可看作消极的语言批评;广义语言批评是指对语言观念、语言现象、语言生活、语用问题等各个方面展开评议、分析、阐发,这可看作积极的语言批评。语言批评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语用和谐。本书所探讨的“语言学批评”属于文艺学范畴,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② 王守元、张德禄主编:《文体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

③ 西方语言哲学的“本体论语言观”主要包含三层意思:语言是人类的本体、语言是世界的本体、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从哲学本体的高度阐述了语言与存在的一体关系;维特根斯坦的“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表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语言化的世界。这两种语言本体观投射到文学领域,形成“语言是文学本体”的观念。

看作是文学的本体,认为文学是语言的建构,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其本身也参与思想内容的构成,具有独立的审美内涵和价值。语言是开启和解答文学文本奥秘的钥匙。

2. 以文学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为研究对象

语言学批评认为,既然语言构成文学的本体,那么,文学研究的对象就不能只停留于文本的外部世界(如作者的人生经历,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宗教、风俗等),而应转向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探讨文学是如何被语言形式所建构,语言形式怎样参与文本思想内容的构成。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如声韵、格律、节奏、音型等)、词汇(如语词的选择与锤炼、虚词、典故、意象等)、语法(如词类、句式、语序、句法结构等)、叙事(如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语态、叙述时间等)、文体(如单一文体、复合文体)等。语言学批评致力于对这些语言形式展开精雕细琢的研究,力图发现文学文本编码的规则和秘密。

3. 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批评武器

面对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语言学批评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呢?与传统印象式批评对语言形式进行直观体悟不同,语言学批评借鉴和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语音学、语义学、语法学等),对语言形式展开精细入微的科学化分析,以丰富、客观的例证使分析和结论有据可查、有理可循。因此,语言学批评极力排除文本外部因素的干扰,将文本封闭起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文本的语言世界。

上述三点表明,语言学批评本质上属于形式批评范畴,是一种面向文学自身的批评形态,它改变了20世纪文学批评的研究格局,将文学批评由外在的“作者中心”转向内在的“文本中心”,为其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语言学批评是如何产生的呢?

语言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或“语言论转向”)的大背景中,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及叙事学批评等文学批评流派紧密相连。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运动将哲学的基本问题由“认识世界”转向“如何认识”，语言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断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①。受此影响和启发，文学理论及批评也纷纷聚焦于语言，重新思考和审视语言在文学及文学研究中的功能和价值。在这场反思与反叛的潮流中，俄国形式主义批评首举“文学自律性”旗帜，批判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包括文本的语言、结构、技巧等形式要素)；英美新批评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作品本身，反对浪漫主义批评的主观与随性，倡导实证性的细读批评，努力建构“文本中心论”大厦；法国结构主义以“文本”取代“作品”，宣布“作者死了”，将文学研究的对象牢牢地锁定在文本自身，致力于寻找不同文本中潜藏的相同的深层结构；叙事学批评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探讨文本的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和叙事人称等。虽然这三大批评流派所处的国度不同，发生的时间先后不一，理论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但基本理论倾向是一致的，体现出鲜明的“以语言为旨归”的特色：文学观上，他们倡导“文学本体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自足体，强调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文本观上，他们倡导“文本中心论”，将文本的语言形式奉为文学的本体，强调文学研究应回归文本自身；批评观上，他们从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汲取丰富养料，倡导精细入微的语言分析，强调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大文学批评流派尽管有各自的称谓和理论侧重点，但由于它们所表现出的共同理论倾向，国内外学界常常将其并置在一起加以讨论，并给予一个总的命名。这些命名主要有：

1. 语言学批评

将三大文学批评流派命名为“语言学批评”的学者主要有美籍学者高友工、梅祖麟，英国学者罗杰·福勒(Roger Fowler)，中国学者葛兆光

^① [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45 页。

等。这种命名方式既涉及文学研究的对象,也涉及文学研究的方法。从研究对象上看,聚焦于文学语言;从研究方法上看,采用语言学的方法。如高友工、梅祖麟采用语言学批评的方法对唐诗进行分析,撰写了著名论文《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尝试》(1968年)、《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1971年)、《唐诗的语义、隐喻和典故》(1978年),在精细入微的爬梳分析中充分展示了唐诗语言的魅力。这三篇论文的中文翻译者李世跃在“新版译后记”中指出:“高友工、梅祖麟两位先生运用语言学、符号学理论对唐诗的精彩分析,不仅堪称语言学批评的杰出典范,也为历史悠远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了一个新生面。”^①中国学者葛兆光在品读高友工、梅祖麟的著作《唐诗的魅力》中发现了语言学批评的魅力,并将其运用到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研究上。在葛兆光看来,“在这种语言形式基础上理解诗歌虽然不免有些拘束、刻板,但总比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想象来得准确”,^②因此,在《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一书中,葛兆光将传统的印象式批评与语言学批评相结合,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脉、语序、格律、典故、虚字、诗眼等形式因素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分析,充分展示了语言学批评在批评方式上的特色和价值。

英国学者罗杰·福勒致力于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研究,出版了11部相关著作,其中《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③一书全面阐述了语言学批评的原则,并对其进行了延伸和拓展。在罗杰·福勒看来,以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批评只注重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分析,忽略甚至排斥文本外部语境以及使用者的影响,这是不符合文学创作

① 高友工、梅祖麟撰写的这三篇论文以《唐诗的魅力》(李世跃译)为书名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更名为《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两个版本内容保持不变。

②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这本书最早于1989年出版,1997年进行了修订,2008年是它的最新版本。)

③ Roger Fowler, *Linguistic Criticism*, Oxford Paperbacks; 2nd Revision Edition, 1996.

实际的,因此,他将语言学批评置于语用学基础上,关注语言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拓展了语言学批评的研究空间。

2. 文本批评/文本主义文论

国内将三大文学批评流派命名为“文本批评/文本主义文论”的学者主要有赵志军、董希文、傅修延等。这种命名方式主要侧重于三大流派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自身。如赵志军在著作《文学文本理论》(2001年)中指出:“之所以将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学派、塔尔图学派、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理论派别或思潮称为文学文本理论,是因为它们不管在理论主张上有多大的差别,都一致地将作品从作者的垄断和控制中解救出来,摆脱了作者对作品的控制和垄断,作品因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学文本理论产生的标志是文学文本取代作者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① 董希文认为,“对文本自身细究探讨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法捷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所在”,^②并细致阐述了三者的文本观。傅修延认为,“文本学是关乎文学作品自身的学问,它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或生成方式”。^③ 以此为基点,傅修延详细分析了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及叙事学对文本中心的追求、后结构主义对文本中心的超越、新叙事学对文本学的开拓以及中国古代文论中丰富的文本观念,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学体系。

3. 形式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文论

国内大多数学者将三大文学批评流派看作是一种“形式主义文论/批评”,因为它们关注的焦点是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形式。如赵毅衡将“新批评”称为“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④;方珊的《形式主义文论》是

① 赵志军:《文学文本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② 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③ 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第1页。

④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